

印象诗人余定川

□ 米黎明

我在乡村教书的时候，去洪口街上赶场，在中街遇到著名诗人张建华和余定川老师采风，见面约一分钟，留给我的印象却是一辈子。他俩身板高直，像两根桅杆，指间都夹着香烟，那香烟像是思想者的火柴。

余老师在县文教局工作时，我每次进局里办事，路过他办公室的门口，都见到他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，我就总想到一句老话：“立不改性，坐不改姓。”记得刚进师范，第一次听余老师的哲学课，那天很热，他讲得大汗淋漓，对于第一次听哲学课的我，如久旱的甘露，滋润着我的心。他讲辩证法，他的口型和声音，都带有辩证的样子，他教育我们什么事都要辩证的看到光明的一面。他来乡下检查工作，见到我的孩子问叫什么名字，他说姓米，应该取名米白。因与李白谐音，不敢用此好名，但我知道余老师的心意，白，清清白白，最高境界就是冰心在玉壶。他退休后在县城滨河路散步，总是正步走，身板挺直，我曾经在一首诗中写到一个人的身姿，著名诗人梅绍静老师给我改成“像把身体拔向天空的屈原”，余老师也让我这样看他！他晒出的旅游照片，给我的印象是一把直尺在测量景物。

花如其树，诗如其人。我多年不喝茶，为了拜读余老师的诗作，特意泡了一杯红茶，边读诗边喝茶，那个安逸劲儿实在清爽，窗外的风敲了几个小时的窗子，急急的想跑进来分享，我猜是灯光泄露了秘密，它在诗中看到了光明的朋友。余老师的诗，掠住了时代的真实，我们欣赏作品，首先是想看看内容和诗心，看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，看那些社会群体的心境，看“大我”，他的诗再现了火红年代里火热的心情，令人向往。余老师说他把那些诗拿出来怕人笑话，没有当代诗歌的样子。其实那是数字化过来人非常珍贵的记忆，同时，那时的诗人是不可能写出和今天一样的诗作的，不可能把算盘珠子写成计算机的键盘。余老师诗歌的艺术美，美在灿烂的阳光里吹着民歌的惠风，载歌载舞的社会生活给了诗人的节奏和舞姿，让观者轻松如云朵，有阳光穿透，也饱含雨水。当时的大诗人如郭沫若、何其芳和贺敬之的作品都具民歌之风；近期文化界开始提倡新大众文艺，如外卖诗人王计兵上了去年的央视《春晚》；去年七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农民工刘诗利的《读书，把自己弄得更好一点》，还多次报道和解读其事迹；今年《诗刊》第一期还推出一组模仿陕北民歌的诗作。

余老师的诗歌，直率真情，歌颂光明，按今天的语来说，充满了正能量的气场。真人写真诗，我想余老师之所以能写出这么亲切优秀诗歌，正是因为余老师内心的积极和阳光，他更想让周围的人也感受到光明和温暖。

春天里的凝望

□ 刘海燕

春天像一把美工刀
雕刻人间
一半是油菜的金黄
一半是新茶的浅绿
光影也跟着慢下来

风把春天抽成蚕丝
蝴蝶悬停的地方
我想让疼痛住进来

当手里捏紧了泥巴，
当土地陷进去一块
才知道那些光滑的平常
都缺一口深呼吸

锄头下去
拨开土的地方露出蚯蚓
和去年烂掉的根
原来春天的底下
埋着这么多
来不及喊出口的疼

我与春光、泥土互相凝望
泥土忽然变得很有重
我半会儿也不敢起身——

我的林伯伯

□ 张平

1972年，我们家跟林伯伯做了邻居，直到1977年我们再次搬家，我们和林伯伯家一共做了五年的邻居。一栋平房，就我们两家人居住，他们家四间房，我们家两间房，厨房合用，水龙头在厨房外，也是合用的。

林伯伯家人口比较多。除了他的母亲林婆婆、他的夫人林妈妈，还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。大女儿是60年代毕业的大学毕业生，分配在甘肃工作，我们做邻居五年，我只见过她一面。除了大女儿读了大学，其余儿女全部受时代的影响，都没有读成大学。我们做邻居时，他的大儿子已经在街道办的厂子里工作了；小儿子也从农村招工回来，在石桥铺工作，那时交通不方便，基本上是一个月回家一次；二女儿和小女儿都还在农村插队，好像一个在垫江，一个在忠县，只有过春节时才能回家。所以，说起来是八口之家，其实平时他们家里就只有四个人——林伯伯、林妈妈、林婆婆，他的大儿子我喊林哥哥。

林伯伯一家为人很谦和，属于书香门第。林伯伯在学校务农且低调，林妈妈漂亮又勤劳，每天走路一个多小时去上班，再走一个多小时下班回家，回来就忙着做家务，没看到过她有停下来的时候。林婆婆腿不太好，但也力所能及地做家务。他们家很和睦，基本没有听到过争吵，直到林哥哥娶了媳妇，才开始有时候发生一点矛盾，但都基本上很平和地过着日子。

我们当邻居时，我9岁。很多年后我才明白，从9岁到14岁，跟林伯伯家做邻居这五年，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。

首先影响我的，是他们家的藏书，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卓娅和舒拉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青年近卫军》还有《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》《柳芭》《第四十一》，我的印象中有80本以上，还有比我人还高一丈的《知识就是力量》期刊。林伯伯允许我随便借阅他们家的藏书，于是我把他们家的小说、杂志全部看了个遍，以至对俄语中女性名字的阴格转换、爱称昵称都非常熟悉。

其次，是他们家订阅的报纸。林伯伯家订有《文汇报》和《参考消息》，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到他们家去看报纸。我还记得报纸

放在里间的缝纫机上，林伯伯常常戴着老花眼镜跟我一起看，不时和我聊上两句，议论一下哪篇文章写得好，从哪篇文章可以看出当下趋势。在这种聊天中，不知不觉地，我知道了天下大事，知道读出字里行间的意味。后来，我越来越觉得《参考消息》的文章，对于写作有很大的好处，这些报道一般是从个人、小事、细节入手，情节很生动，观点很明确，论证很有逻辑，令我受益无穷。直到今天，我的阅读速度在很多人看来很快，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。

第三，是他们对我做家务能力的提高。我印象中，做家务的本事并不是我的父母教的，基本上是林伯伯和林妈妈教的。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林伯伯教我炒蛋炒饭的样子。他坐在煤球炉前的小凳子上，教我打破蛋壳，用筷子把碗里的鸡蛋调散，教我撒点盐，倒油煎蛋，最后做成蛋炒饭，临起锅前一定要放点葱花，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。早上起来打开煤球炉、晚上给煤球炉“备火”，包括用煤粉混合黄泥，打成煤球、煤饼，都是他们耐心教我的。林妈妈很会做衣服，她有一架缝纫机，一家人的衣服自己裁剪、自己缝纫，每年都要给她远在农村插队的女儿们做衣服，那真是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。我很喜欢她做衣服，看着看着就想跟缝纫机。林妈妈总是鼓励我大胆地尝试，很快我就可以熟练地踩缝纫机了。林妈妈还手把手地教我裁衣服、裁裤子，后来我真的自己裁剪过并给自己做成了衣服。我的大女儿出生后，穿过不少我给她裁剪并缝纫的小裙子、小衣服，直到现在我都还可以很熟练地踩缝纫机。

那个年代缺吃少穿，蔬菜尤其难买。林妈妈就在我们房子旁边的空地开荒，自己种上各种蔬菜，有四季豆、豇豆、南瓜、冬瓜、藤藤菜。我看了非常羡慕，于是林妈妈“划拔”了一小块地和一小块水田给我种，我学会了挖土、施肥、除草、种菜，用竹棍搭架架，种四季豆和豇豆，水田种藤藤菜。那个时候老停水，深更半夜来水了，我们会很兴奋地爬起来给水田灌水。南瓜是懒庄稼，底肥施够了就可以不管了，它自己会长得很好，有一年我们种的南瓜大丰收，满满地堆了半壁墙，最后吃得人发吐。我最喜欢的还是藤藤菜，掐了又长，长了又掐，

一直可以吃到10月份。哎，直到现在，我最爱吃的蔬菜还是藤藤菜，清炒、炆炒、凉拌、煮汤，怎样都好吃，永远吃不够。

重庆的夏天很热，那个时候没有空调，家里最多就是个小风扇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于是就有了重庆式消暑——歌凉。所谓歌凉，就是在一大块大家公认会有点风的空地上，傍晚的时候，不用谁招呼，大家打打水，一盆一盆地用水洒洒地面，水蒸气带走热量，如此三番降温之后，各家把歌凉的家什——凉板、凉椅、板凳等搬来，聚在一起“冲壳子”。孩子们最喜欢这种时候，往往会有人在这时候讲故事。林哥哥特别会讲鬼故事，我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吓得尖声惊叫，最后上厕所都不敢一个人去，大家成群结队一拥而上，再成群结队一拥而下。我们那个时候听的故事，有《一双绣花鞋》《金三角》《第二次握手》等。重庆歌凉一般要歌到后半夜才各自回家，最晚的时候还有人会通宵在外露宿。

后来，林婆婆患了肝病，去世时有80多岁。与现在不同，林婆婆是在家里去世的，我感觉到她跟平时睡着了一样，一点都不令人害怕。林婆婆是肝病，生病的迹象只是脸色变黄了一些，我从来没有看到她痛苦的样子，据大人们说，她确实少见到没有遭受癌症疼痛，平静安详地过世。林婆婆去世后，林妈妈的母亲来到了这个家庭，我们称她林外婆。如果说林婆婆还有点威严的话，林外婆简直就是慈眉善目了，永远都微笑着。

林伯伯和林妈妈都是湖北人，林伯伯教无线电专业，应该是受了不低的教育。林伯伯和林妈妈说话都是轻言细语的，语言文明，举止文雅；他们为人慷慨，关心他人，爱护老幼，体现出良好的教养。他们家的门对我来说都是敞开的，我从来都是随进随出，如入自己的家一般，没有感觉到半点生疏不遑。

时过境迁，岁月如流。林伯伯和林妈妈已离开我近三十个年头，而今，我回想起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尤其是他们对我的好，我的眼中便浸满深情的泪花。又一个清明不期而至，谨以此文缅怀曾经给予我恩情的林伯伯和林妈妈，遥祝他们在天国幸福和安宁。

缅怀恩师廖忆林

□ 塔双江

这地理上的空间没有隔断我们的师生情谊。我经常和他打电话，一通电话就是一个小时。我们聊文学，聊工作和生活，遇到社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《远逝的童谣》。周辉枝邀请廖忆林老师为我这个素昧平生的无名小辈写序，廖老师没有推辞，他认真细致地完成了精彩的序言，而且没有收取分文辛苦费。

书出版之后，汶川老作家陈晓华老师悄悄告诉我，廖老师写的序是认真的，他把书是仔细看完了的！我知道，廖老师的书序在夸奖、鼓励我的同时，还为我把脉问诊，指点迷津。我真的是激动万分，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抽空去拜访廖老师。大概是那年12月的一个傍晚，我带着女儿从汶川渡口坐公共汽车去了一趟省城，在巴金文学院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廖老师。他个子瘦小，衣着简朴，平易近人，一席话重心长的长谈，便使我成了廖老师家的常客。每次去，我都带着习作，而每次廖老师都不厌其烦，十分耐心地为我辅导和精心修改。

大概是2004年，我去了位于川、甘、陕交界的偏僻小县城谋生。在九寨沟中学我独自创办了《九寨沟中学》校刊并担任主编，且一千差不多就是10年，在那里，我发奋读书，刻苦写作，竭尽全力办校刊，心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干出名堂，一定要混出个

人样，否则，我无颜去见廖老师。这期间，我和我的编辑们起五更睡半夜，积极向全校师生组稿，向海内外著名作家、诗人、摄影家、书法家、画家约稿，以采风、笔会、讲座、观摩等多种形式办刊，校刊不断赢得校内外师生的纷纷好评，其交流不仅遍及大江南北，甚至还包括香港、台湾以及美国、日本、德国等世界各地，校刊在全国中小学优秀校内报刊评选中获得“一等奖”，学校文学社也获得“全国九十九佳文学社团”“全国优秀学校图书馆”，我个人也被四川省青少年作家协会评为“优秀指导老师”“十佳名师”“模范主编”……在创作上，我夜以继日，勤奋耕耘，《倾诉》《行走》《想象雨季》等文集相继出版。

20多年里，因为生计，我和廖老师见面的时间很少，但他对我的影响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。没有他，就不可能有我的文学之路。如今，廖老师永远离开了我。清代诗人罗振玉在《鸣沙石室佚书·太公家教》中写到：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我对廖老师的恩情，将永远铭刻我心。

祖父很久未摸唢呐。这几日，却频繁地擦拭这位老伙计，重新换上燕麦秆做的糜子。随着子女的相继离世，这位老伙计帮他分担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最后像往事一样蒙尘于书柜的一角。这些年发生的事，是他当初萌生多子多福的念头时没想到的。

“去，把鼓和钵全部搬出来。”这时候，祖母的耳朵还能够听清。接到指令只需要愣一下神，短暂地思考便能理清祖父的意图。她去卧室里那张橘黄色的牛皮床边，将几样婚典常用的乐器搬出来，堆在祖父旁边。坐下来看他漫不经心地擦拭。他们经常谈起婚典时，一些已经失传的礼节，祖母会唱起婚典上的唱词，祖父就合着节拍吹奏。他的儿子们在家时，鼓和钵全都奏起来，就是一场小型的音乐会。母亲年轻时，也喜欢即兴唱几首流行歌。不过这种雅兴随父亲的死而夭折，现在她只是个古怪的妇人。祖父在舞象之年，靠唢呐撑起一个锣鼓队。儿子们逐渐成年，又抓住三媒六聘的历史尾巴，靠传统婚典火了一把。同一班人马，在这封闭的神秘花园里自得其乐，创造了半个世纪的辉煌。然而，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，班子里的人马毫不留恋地抛弃了锣鼓队，选择远走他乡。因此，在漫长的衰老期里，祖父都很少看到他们的儿子们。

孩子们回到莫家岩的方式各有不同，先走的老七被装进骨灰盒带回家；老大拉着拐乘坐四十八小时绿皮火车，到家一年后离世；老三全力以赴建造一座楼房，竣工期因肝病而死；老五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突然出现在家门口，之后便四处求医问药；其他儿子依旧远在他乡。

祖父摸着这些老伙计，一样一样精细地擦拭过去，半年来，连续两次住院经历，让他感受到死亡的临近。远方的儿子们也不像往昔那样顺从，甚至敢直接对他叫板，他在某个瞬间感受到痛苦和绝望，摸到这些老伙计时，借着点儿酒后余味，竟眼泪汪汪。

“哎，生多了。一会怀疑偏心这个，一会怀疑偏心那个。”

“你爸爸那时候，生那么重的病，我们不照顾他谁照顾？”祖母含泪补充道，“自己生的，疼啊。那几兄弟就说我们偏心。”

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追随历史的洪流，讲起患病死亡的儿子和车祸去世的女子，多子女家庭的恩怨，往往伴随着毫无意义的争斗。以及希望对方穷困潦倒，而自己风生水起的邪恶。孩子们留给他们的唯一的纪念物，只有无穷无尽的痛苦。“我这肚子全是气。”祖父说，“全身上下没别的毛病，就是气。”他长长地打了个响嗝，与那位一言不合指天为誓的霸权主义老头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“我最近总是梦见你爸，还像以前穿的那一身。”祖母说。

唢呐调

□ 刘小春

“他就没离开过。”母亲说她在家里中见过丈夫的魂魄，像一缕烟轻轻飘飘地从卧室的窗口飘走。

下午，村里传来一阵突兀的鞭炮声。“死的是李莫芳”，祖父说，“他得的是一种肝病，肚子里全是水。”这个二婚上门女婿，在莫家若度过了最后温馨又痛苦的日子，像他的日常牌局那样，起伏输赢难以定论。第三天早晨，我还在睡梦中，丧葬队伍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凄凄哀哀地穿过门前公路，吹唢呐的是堂妹英的丈夫，这位幼年时期就走街串巷耍猴人，在与英结成姻缘后，仅用三个月就学会了唢呐的吹奏技巧，置办了一套婚典所用的花轿，又添置了一台电子钢琴。祖父后来只负责打鼓。说实话，七十岁以后肺活量下降，已经不适合长时间吹奏唢呐。我起床时，送葬队伍已经原路返回，全村都去主顾家吃席，空气中弥漫的硝烟久久不散。

近一年，母亲都不参加任何葬礼，以避免死亡热气的冲撞。年轻时，仗着胆大总是冲在死人棺材前观望，津津有味地谈论人死后的枯朽面容，装着和未尽心事，甚至将我和相推至棺材跟前看热闹，成为我童年时期的噩梦。父亲从生病到死亡，母亲的体面与灵魂受创，身体每况愈下、毛病不断，才收敛住这股窥探亡灵的冲动。在算命师的警告下，她甚至连葬礼后的宴席也不参加。

祖母最喜欢看这种稀奇。上个月的一天早晨，瘫痪已久的莫林子去世，听到报信的鞭炮声后，她第一时间赶过去，全程站在门口看逝者更衣。事后她说逝者骨瘦如柴的身子，剃光后雪白的屁股，就像一柱从未见过的奇闻。孤陋寡闻的封闭式人生里，她只能如此自寻乐趣。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女人，又连续痛失几个子女，已经感受不到死亡的痛楚和寻常的欢乐。新冠最严重的时候，祖父去场镇边上的村子出丧那天，站在凌晨六点的寒风里整整吹了一个小时，突然发现站在他身边吹奏唢呐的不是儿子们。那天后就生了一场大病。后来，祖父还是常将乐器搬进搬出。但他再也不吹奏，母亲和祖母也不会唱起熟悉的小调。他们老了，只有这些老伙计懂他们的悲欢。

走在武侯祠东街（外一首）

□ 冉启成

在武侯祠东街，以及
洗面街横街、武侯祠横街
我陌生地在人行道上走过

位置

喝茶的时候
有人常常喜欢，坐在
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
我也喜欢
坐在一个熟悉的角落

在茶馆，喝茶久了
哪一天哪个位置空着
喝茶人心里
就有一个位置空着
会无名生出一丝牵挂来

街旁一家医院，挤满了病人
医生是他们急于治愈的救星
而我，是一个行走在
人流大街的有病之人
坐在店里的佛尊、菩萨
你们，可不可以是
治愈我伤痛的医生